

## 中东政治与社会

伊斯兰教与中东民族国家构建<sup>\*</sup>

张燕军

**摘 要:** 公元7世纪以后的中东政治深深地打上了伊斯兰教的烙印。在现代中东政治中,伊斯兰教构成了影响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由于两者间存在的不协调,使伊斯兰教对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并存。这一特性在沙特阿拉伯的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伊斯兰教在塑造沙特国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沙特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滞后。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既有历史传统的影响,也与伊斯兰教的某些内生性特征与社会发展不适应密切相关。

**关键词:** 民族国家构建;伊斯兰教;民族主义;中东;政治稳定

**作者简介:** 张燕军,博士,咸阳师范学院资源环境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站博士后(咸阳 712000)。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7)01-0106-12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宗教与政治便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仅前现代社会的政权需要从宗教中寻求政治合法性,部分现代国家也都深受宗教的影响。对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印度著名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雷蒙·潘尼卡(Raymond Panikkar)认为,一切宗教问题都包含着政治性,许多世界政治问题也都具有宗教特征。“宗教从来都不是私人的,而是共同的,它与政治关系密切。”<sup>②</sup>与此同时,日益滋长的恐怖主义以及伴随而来的反恐战争,正在推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诸多变迁,也在不断强化

<sup>\*</sup>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科研基金“民族国家构建与中东国家政治稳定研究”(14JK1787)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咸阳师范学院“青蓝人才”专项基金(XSYQL201504)的资助。

<sup>②</sup> [印度]雷蒙·潘尼卡:《对话经——诸宗教的相遇》,王志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页。

宗教在日常生活和全球政治体系中的角色地位。<sup>①</sup> 对于中东地区而言,宗教与政治、民族的关系尤为密切。本文主要考察伊斯兰教与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

## 一、伊斯兰教影响下的中东政治与民族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认为,宗教是一种规范社会关系的手段,宗教在政治中的作用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得以体现:第一,权力直接依靠宗教,如神权政治;第二,宗教可以使统治精英合法化;第三,宗教可为谋求权力者提供受他们操纵的深层次结构、信仰和特征。<sup>②</sup> 发端于公元7世纪的伊斯兰政教关系模式深刻影响着此后1,400多年的中东政治,伊斯兰教对中东国家的政治、民族等问题始终发挥着重要影响。

### (一) 政教合一:伊斯兰教影响下的中世纪中东政治

伊斯兰教自诞生伊始就与政治密不可分。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的“乌玛”(al-Ummah,穆斯林公社)既是宗教社团,又是政权组织。作为真主使者的穆罕默德掌握着“乌玛”的最高宗教和世俗权力,“乌玛”的实质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因此,“乌玛”虽只具备简单的国家形态,但实际上已体现出伊斯兰政治模式的核心要义,即政教合一,此后的阿拉伯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可被视为“乌玛”政治模式的延伸。中东地区在中世纪形成的这种以政教合一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模式,不仅塑造了阿拉伯民族的政治文化,而且极大地影响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其他民族的政治制度。

奥斯曼帝国建立后继承了这种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苏丹不但掌握着世俗权力,同时还是最高宗教领袖哈里发,拥有对帝国内全体穆斯林的统治权,奥斯曼帝国因此成为一个封建神权帝国。与突厥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相似,德莱木人建立的布韦希王朝(Buwayhid Dynasty)、波斯人建立的萨法维王朝等政权的统治者都自称是“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试图借助神权力量来巩固世俗统治。

在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下,伊斯兰教成为中世纪中东政治和社会的主导力量。

首先,伊斯兰教对中东政治的主导作用突出表现为其对政权的深度介入和对政治发展的深刻影响。阿拉伯帝国时期,各王朝政权均借助伊斯兰教实现政权的巩固,统治者都自称哈里发,不仅牢牢掌握着世俗权力,而且将自己定义为“真主在大地上的代理人”。伊斯兰教还是影响政治决策的重要因素,统治者以真主之名发布

<sup>①</sup> [美]莱斯特·库尔茨:《地球村里的诸神(第2版)》,薛品、王旭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sup>②</sup> [英]特德·C.卢埃林:《政治人类学导论》,朱伦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

重要政令。政治行动通常被解释为履行宗教义务,进而使宗教活动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伊斯兰教因此成为政权运作的重要支柱。一方面,伊斯兰教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又为政权提供了可供操纵的社会结构。反抗统治者的群体和他们反抗的对象一样,往往求助的是同一个真主、同一位先知以及同一个信仰群体。<sup>①</sup> 对此,美国宗教社会学家罗纳德·约翰斯通(Ronald L. Johnstone)指出,“作为一种宗教的伊斯兰教,至少从其表面上看要比今日的基督教更像是一个政治—宗教组织,它容易利用宗教为伊斯兰国家或其内部派别的政治行动进行辩护”<sup>②</sup>。

其次,伊斯兰教对社会的规范作用表现为以教义和教规形式确立穆斯林的行为准则、宗教义务和社会习惯。其中,服从宗教领袖成为穆斯林履行宗教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伊斯兰政权习惯性地以宗教名义要求民众服从统治者的统治,统治者借助宗教强化政权对社会的控制,有效降低了行政管理成本。

最后,伊斯兰教对社会的整合作用表现为宗教成为凝聚各阶层和势力的重要工具。社会学家涂尔干和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都认为,宗教具有社会整合和凝聚功能。伊斯兰教宣扬的平等、宽容、仁爱等普世性观念成为社会整合的有效工具,对社会各阶层均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整合能力,历史上诸多伊斯兰政权都藉此发展成为疆域辽阔的大帝国,并在文化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欧洲社会相形见绌。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曾指出,伊斯兰文化早在 1,400 多年前就形成了人类生活——经济、技术、社会精神所有形式的连带关系理论,西方只是最近随着马克思的某些思想和现代种族学的诞生才找到这些理论。<sup>③</sup>

## (二) 教族合一：伊斯兰教影响下的中东诸民族

伊斯兰教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东政治,而且对中东诸民族的发展及其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以阿拉伯民族为例,在伊斯兰教兴起前,阿拉伯半岛贫富分化加剧,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处于大变革的前夜。在此背景下,伊斯兰教的创立顺应了阿拉伯各部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在阿拉伯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在历史层面,伊斯兰教推动了阿拉伯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乌玛”观念的形成,促使伊斯兰教以信仰为纽带实现了不同血缘群体的联合,超越了血缘

① [美]彼得·卡赞斯坦:《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秦亚青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2 年版,第 194 页。

② [美]罗纳德·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一种宗教社会学》,袁亚愚、钟玉英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79-280 页。

③ [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种族与历史·种族与文化》,于秀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4 页。

群体的狭隘性和排他性。共同的宗教信仰使阿拉伯人逐渐形成了共同的语言、民族文化、社会习俗以及地域和经济联系,推动了阿拉伯民族的初步形成。另一方面,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对外传播推动了阿拉伯民族的发展壮大。阿拉伯帝国真正傲视群雄之处,与其说是实际的军事征服本身,不如说是被征服地区民众的阿拉伯化与伊斯兰化。<sup>①</sup> 来自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在上述过程中迁移至西亚北非广大地区,使当地的埃及人、叙利亚人、柏柏尔人、伊拉克人等其他民族在阿拉伯化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统一的阿拉伯民族。

其次,在语言层面,伊斯兰教为阿拉伯语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进而为阿拉伯民族的发展和阿拉伯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语言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也是其文化载体,阿拉伯语在历史上之所以受阿拉伯民族兴衰的影响较小,主要在于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采用的是标准阿拉伯语,阿拉伯语因此成为全世界穆斯林履行宗教功修所使用的语言。伊斯兰教不仅为阿拉伯语的发展提供了载体,而且确保了阿拉伯民族意识的传承。

最后,伊斯兰教本身也成为阿拉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形成了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核心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宗教色彩浓郁的社会环境中,伊斯兰教渗透至阿拉伯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阿拉伯人思维方式、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使阿拉伯民族“教族合一”的特征逐渐凸显。

伊斯兰教不仅使阿拉伯民族形成了“教族合一”的特点,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波斯人、突厥人等中东地区其他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这些民族的文化在历史进程中与伊斯兰文明实现了融合,使伊斯兰文化逐渐成为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阿拉伯穆斯林文化水平较低,因此在伊斯兰文明涵盖地区活跃的学者与科学家主要是犹太人、基督徒、琐罗亚斯德教徒,或是刚刚改宗伊斯兰教的信徒,这些人的观念依旧受到此前宗教信仰的影响,在中东形成的伊斯兰文明开始从诸多宗教传统与哲学积淀中汲取营养。<sup>②</sup> 因此,“伊斯兰文化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等诸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sup>③</sup>。不仅阿拉伯民族表现出“教族合一”的特征,波斯人和突厥人的民族文化也深深地打上了伊斯兰教的烙印,《古兰经》成为其文化的核心,伊斯兰教逐渐在这些民族的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伊斯兰教对中东政治、各个民族的历史演变及其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使

<sup>①</sup> [英]伯纳德·路易斯:《中东:自基督教兴起至二十世纪末》,郑之书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4 年版,第 55 页。

<sup>②</sup> [美]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美]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哈全安、刘志华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0 年版,第 109 页。

<sup>③</sup> 哈全安:《中东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06 页。

得中世纪以来的中东地区政治和社会发展打上了伊斯兰教的深刻印记。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所言,政治在本质上是宗教的,反之亦然。<sup>①</sup>

## 二、伊斯兰教对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

由于历史、文化和传统的惯性,伊斯兰教对近现代中东政治,尤其是民族国家的构建发挥着重要影响。一方面,伊斯兰教成为中东国家早期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巩固政权、反殖反帝的重要推动因素;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对现实政治关系表现出的种种不适应,也使民族国家的构建面临诸多困扰。

### (一) 伊斯兰教对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积极影响

自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帝国主义国家对中东地区侵略和扩张的加剧,以摆脱殖民压迫为目的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中东兴起。伊斯兰教依靠其在中东地区深厚的文化和社会根基,成为中东民族解放运动动员的重要手段。伊斯兰教对中东国家早期争取民族独立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伊斯兰教为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例如,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先驱梅萨利·哈吉(Messali Hadj, 1898~1974 年)创建的多个民族主义组织都公开宣称以伊斯兰教为指导原则,如 1926 年由法国阿尔及利亚裔侨民发起成立的“北非之星”、1937 年成立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党(Partidu Peuple Algerien, 简称 PPA)以及 1946 年成立的“争取民主自由胜利运动(Mouvement pour le Triomphe des Libertés Démocratiques, 简称 MTLD)”等。二是伊斯兰教在反殖反帝运动中表现出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无论是在号召广大穆斯林投身反抗西方侵略、赢取国家独立的斗争方面,还是在动员文盲率较高的下层民众参与社会运动方面,伊斯兰教均具有难以替代的优势。以阿尔及利亚为例,伊斯兰改革运动的领袖本·巴迪斯(Abdel Hamid Ben Badis)积极在广大穆斯林中宣传阿尔及利亚民族意识、推动国家独立,他倡导“伊斯兰教是我们的宗教;阿拉伯语是我们的语言;阿尔及利亚是我们的祖国”,以宗教语言提出了阿尔及利亚全民族争取解放和独立的目标。<sup>②</sup>本·巴迪斯创建的伊斯兰贤哲会(Association of Algerian Muslim Ulema)作为阿尔及利亚重要的爱国力量,在该国民族解放斗争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战后,伊斯兰教在中东国家稳固政权、捍卫民族主权、推进民族国家构建、维护地区国家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在民族团结方面,独立后的中东国

<sup>①</sup> 刘小枫:《当代政治神学文选》,蒋庆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 页。

<sup>②</sup> 赵慧杰编著:《阿尔及利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3 页。

家大多将伊斯兰教确立为国教,这种做法有助于迅速凝聚广大穆斯林对新生民族国家的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心、促进民族团结,从而捍卫国家独立。其次,在国家构建方面,伊斯兰教为中东民族国家构建提供了现成的法律基础和政治组织形式,填补了独立之初中东国家在政治制度上的空白,为国家制度建设与权力运作奠定了基础。海湾国家不仅将伊斯兰教确立为国教,而且实行宗教法制,以伊斯兰教法作为整个国家立法的渊源。<sup>①</sup>再次,伊斯兰教规定了处理伊斯兰社会内部关系的准则和义务,如穆斯林平等原则、缴纳天课的宗教义务等,这对缓和国内社会矛盾、推进民族国家构建、营造稳定的发展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最后,伊斯兰教加强了中东伊斯兰国家在反殖反帝斗争中的合作与联系,推动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高涨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联合,对共同维护本地区国家的集体利益产生了积极影响。

## (二) 伊斯兰教对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负面影响及其根源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在阿以冲突和现代化进程中遭受重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中东政治的影响逐渐提升。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为对抗苏联,在阿富汗大力扶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导致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为重要思想基础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迅速兴起,挑战中东民族国家政权和现行制度,严重威胁着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

在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伊斯兰教作为政治和社会的主导力量,在塑造国家认同和建设国家制度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伊斯兰教塑造了与现代国家认同相悖的宗教认同。美国中东问题专家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在《信仰与权力:中东的宗教和政治》一书中指出,源自伊斯兰教早期历史的某些观念对当前依然有着重大影响,突出表现在对穆斯林自我意识的塑造上,伊斯兰教成了绝大部分穆斯林认同、忠诚和权威的最终基础。<sup>②</sup>伊斯兰教塑造的超国家认同削弱了穆斯林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为中东政治稳定埋下了隐患,并成为民族国家构建长期受阻甚至陷入倒退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使中东民族国家的国家制度建设难以彻底摆脱无序和混乱。中东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因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始终未能解决权力产生、运作、更替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权力僵化、政治失序和继承权混乱成为长期困扰政权的问题,并尤以沙特最为突出。

宗教问题常常作为政治问题周期性地出现在世界各国社会中,这种政治—宗教现象在亚、非、欧发展中国家十分普遍。<sup>③</sup>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地区,宗教与政治的交互影响尤为突出,伊斯兰教与中东民族国家构建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发展的重

<sup>①</sup>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74页。

<sup>②</sup> Bernard Lewis, *Faith and Power: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xiv.

<sup>③</sup> [美]罗纳德·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一种宗教社会学》,第274页。

要障碍因素,其内在根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伊斯兰教与世俗政治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其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其诞生之初均是以文化形态而非政治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存在。但伊斯兰教自初创以来便与政治紧密相联,是政治参与性极强的宗教。伊斯兰教不仅向穆斯林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穆罕默德创建的“乌玛”是伊斯兰教发展壮大和阿拉伯民族统一的基础,历史上的伊斯兰政权基本上都沿袭了以“乌玛”为核心的政治模式。因此,伊斯兰教早已超越纯粹的宗教范畴,成为中东政治文化传统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即便到了现代,伊斯兰教对中东国家的政治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基督教和佛教自近代以来都实现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改革,但伊斯兰教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时常希冀从传统教义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试图通过回归传统来“净化社会”,导致理想和现实社会产生悖离。自 19 世纪至今,面对种种社会问题,伊斯兰世界一直存在以回归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传统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潮,始终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回摆,这非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加深了伊斯兰教与现实政治之间的鸿沟。

最后,在现代世界,民族性或民族主义已取代宗教成为凝聚民众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成为一种世俗化的政治演进过程,但在伊斯兰世界,因受“乌玛”观念的主导,宗教认同超越民族认同,使得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在推行现代政治制度时,仍不得不顾及民众宗教情感和伊斯兰政治文化所带来的强大社会影响,部分领导人自身也从伊斯兰教中寻求统治合法性。这一现实导致宗教权威的进一步巩固,其结果是宗教传统与民族国家构建、现代化发展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和内在冲突。无论什么时候,当宗教与民族主义相遇,宗教的挫败都不可避免地表现在其结构重要性的丧失或信仰根基的动摇,但伊斯兰教是唯一的例外。<sup>①</sup> 因此,在所有世界性宗教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伊斯兰教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它不但创造了前工业化时代的伟大文化传统和宗教认同,而且确立了一种社会共同体的信仰。<sup>②</sup>

### 三、伊斯兰教与沙特阿拉伯的民族国家构建

“民族国家构建(Nation-State Building)”作为一种基于西方历史的政治理论,包括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两个层面:民族构建是指文化—政治共同体和国家认同的形

<sup>①</sup> Slavica Jakelc, *Collectivistic Religions: Religion, Choice, and Identity in Late Modernity*,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pp. 28-29.

<sup>②</sup> Robert W. Hefner and Patricia Horvatic, *Islam in an Era of Nation-States: Politics and Religious Renewal in Muslim Southeast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p. 20.

成过程,国家构建则是指国家制度建设、资源整合与权力有效实施的过程。“民族国家构建”理论是18世纪以来欧美地区政治和经济变革的产物,工业化和宗教改革是其产生的重要条件。

对于“民族国家构建”概念是否适用于中东地区,波斯尼亚学者马里奥·阿波斯托洛夫(Mario Apostolov)认为,“民族国家”的理念是欧洲对中东地区最成功的出口商品,然而舶来品的性质注定了其在中东水土不服。<sup>①</sup>显然,阿波斯托洛夫的观点有失偏颇,其过于强调“民族国家构建”理论的地域性,而忽视了这种理论适用的广泛性。在当今世界,民族国家已成为最普遍的政治组织形式,推进民族国家构建既是政治生活的中心内容,也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政治稳定的保障,中东国家概莫能外。

在政治和社会深受宗教影响的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对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沙特的民族国家构建。一方面,沙特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因坐拥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城而成为全球穆斯林的精神中心;另一方面,沙特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与伊斯兰教息息相关,是伊斯兰教与中东民族国家构建之间复杂关系的最佳例证。

### (一) 早期沙特政权的民族国家构建

沙特历史可分为早期国家和现代国家两个阶段,早期国家包括第一沙特王国和第二沙特王国,两个王国的诞生均与伊斯兰教有着密切关系。18世纪,基于共同的利益需求,以伊本·沙特(Muhammad Ibn Saud)为首的沙特家族与以阿卜杜·瓦哈卜(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为代表的谢赫家族结成政教同盟,沙特家族为谢赫家族的传教提供保护,谢赫家族则向沙特家族提供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并赋予其政治和宗教的双重合法性。这种联盟实际上是对伊斯兰复兴运动先驱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ah, 1263~1328年)思想的实践。伊本·泰米叶认为,两种威权组织应该构建一个正直的社会,即由乌里玛决定法律内容,由统治者执行法律,公民无条件服从领导者。<sup>②</sup>

第一沙特王国和第二沙特王国均建立在上述政教结盟的基础上,成为近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在政治和国家层面的最早实践。由于这两个王国存在的历史较短,且早期沙特尚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伊斯兰教对民族国家构建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即便如此,伊斯兰教对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核心意义已得到体现:宗教信仰既是文化认同,又是政治认同;伊斯兰教成为政治组织、立法和社会结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具备国家形态的早期沙特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

<sup>①</sup> Mario Apostolov, *Christian-Muslim Frontier*,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61.

<sup>②</sup> [美]詹姆斯·温布兰特:《沙特阿拉伯史》,韩志斌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138页。



不仅被现代沙特全面继承,而且影响了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

## (二) 伊斯兰教与现代沙特的民族国家构建

20 世纪初,伊本·沙特重建沙特王国后,继续将瓦哈比教义作为改造社会、整合国家和巩固政权的政治工具。为实现上述目的,伊本·沙特发起了在现代沙特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伊赫万运动(Ikhwan Movement)”<sup>①</sup>,这场运动奠定了沙特作为现代国家的基础,伊斯兰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伊赫万运动”推动了沙特的国家构建。该运动兴起时曾遭到贝都因人的反抗,但乌里玛阶层为伊本·沙特推行的政策提供了宗教合法性支持。“伊赫万运动”自 1912 年兴起后,逐渐发展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运动,对伊本·沙特而言,通过“伊赫万运动”吸收更多的追随者意味着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沙特政权能够得以巩固,而对贝都因人的控制则意味着建构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必要条件业已形成,因为现代国家不允许社会实体在军事和政治事务方面以任何形式实现自治。<sup>②</sup>正因为如此,伊本·沙特要求所有的贝都因部落都必须加入“伊赫万运动”,以此消除阿拉伯半岛的无政府状态,促使传统游牧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在这一过程中,习惯于游牧生活的贝都因人开始在社区定居和生活,促进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被视为沙特政权在国家构建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

第二,“伊赫万运动”确立了沙特的国家疆域,奠定了沙特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伊赫万运动”打着“伊斯兰圣战”的旗帜进行狂热的军事征服,使沙特王室在 20 世纪初消灭了拉希德家族统治的杰贝勒沙马尔酋长国(Emirate of Jabal Shammar),夺取了半岛北部的锡尔汉谷地,后来又打败了控制汉志地区的哈希姆家族,最终实现了内志、汉志等地区的统一,并在 1927 年迫使英国签订《吉达条约》并正式承认沙特的独立和统一,确立了沙特民族国家构建的国家疆域。

第三,“伊赫万运动”推动了沙特国家认同的形成。部落文化的狭隘性和部落利益至上的观念使其难以超越本部落利益,并在更广泛意义上实现各部落的团结和统一,但“伊赫万运动”使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伊赫万”在字面上意为“兄弟”,是一种建立在严格的瓦哈比原教旨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政治组织。<sup>③</sup>伊本·沙特借助“伊赫万运动”,对沙特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进行了改造,将犹如一盘散沙的各部落招至瓦哈比派教义的旗帜下,为巩固新政权提供了组织基础。

<sup>①</sup> “伊赫万”原意为“敬奉唯一真主兄弟会”,实际上是以宗教为手段建立的改造游牧民的政治组织。

<sup>②</sup> Kenneth Christie and Mohammad Masad, *State Form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91.

<sup>③</sup> Gary Troeller, *The Birth of Saudi Arabia: Britain and the Rise of the House of Sa'ud*, Abingdon: Routledge, 2013, p. 129.

至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伊赫万运动”与伊本·沙特在对运动目标和瓦哈比教义的理解上出现了重大分歧,为维护既得利益以及同英国和邻国的关系,伊本·沙特最终解散了“伊赫万运动”。尽管如此,伊本·沙特借助“伊赫万运动”初步奠定了现代沙特的国家基础,在构建民族国家方面迈出了关键性一步。

二战后,沙特的民族国家构建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伊斯兰教在其中仍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沙特家族继续将伊斯兰教作为谋求政治合法性和扩大地区影响的重要工具。在沙特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作为沙特民众宗教政治认同的瓦哈比派教义,被视为建立和维持政治合法性即进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对沙特王室来说,伊斯兰教始终是维持权力的工具,<sup>①</sup>在对外和对内两个层面均得到充分体现。

在对外层面,沙特将传播伊斯兰教作为拓展国际影响、增强国内统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沙特政府的目标是在全世界通过传播瓦哈比教义提升国际影响力,为实现这一目标,沙特已投入 1 万多亿美元。<sup>②</sup> 这些举措使沙特提升了国际声誉,巩固了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强化了沙特家族与谢赫家族的联盟,增强了沙特王室在国内的声望,有利于维持沙特家族的统治。

在对内层面,沙特家族继续强化同谢赫家族的政教联盟,将伊斯兰教作为稳定政权的工具,同时将伊斯兰教作为反对政治改革的挡箭牌。二战后,沙特王室继续秉承家族传统,与瓦哈比运动创始人阿卜杜·瓦哈卜的后裔谢赫家族结盟,沙特国王兼任瓦哈比派教长,同时握有世俗和宗教的最高权力,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全面主导沙特的政治生活;谢赫家族则分享部分宗教权力,并为沙特家族的统治提供宗教合法性支持。两大家族的联盟关系构成了沙特家族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瓦哈比主义的作用之一就是服务于沙特家族的政治统治,对谢赫家族而言,要求民众服从沙特家族的统治是其重要的职责。<sup>③</sup> 与此同时,沙特王室还利用瓦哈比教义作为应对政治变革诉求的工具,沙特王室的支持者表示,君主制王国可以在不丧失任何伊斯兰特征的前提下通过改变经济、教育和社会结构来推动发展。<sup>④</sup> 实际上,这体现了沙特政府借助瓦哈比派的宗教权威来否定进行重大政治改革必要性的意图。

从国家发展历程来看,沙特以伊斯兰教作为国家认同、以石油财富作为物质基础的民族国家构建模式有其合理性,该国以瓦哈比教义凝聚民众和增强政权合法

<sup>①</sup> Stig Stenslie, *Regime Stability in Saudi Arabia: The Challenge of Succession*, Abingdon: Routledge, 2012, p. 14.

<sup>②</sup> Sarah N. Stern, *Saudi Arabia and the Global Islamic Terrorist Network: America and the West's Fatal Embrac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 131.

<sup>③</sup> Sherifa Zuhur, *Saudi Arabia: Islamic Threat, Political Reform, and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 Carlisl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5, p. 17.

<sup>④</sup> Anthony H. Cordesman, *Saudi Arabia Enter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Political, Foreign Policy, Economics, and Energy Dimensions*,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003, p. 157.

性,以石油财富发展民生以换取民众对沙特王室的忠诚。这一策略使沙特平稳度过了包括近年来中东变局在内的多次地区性危机。但沙特的民族国家构建模式仍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全球化浪潮和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使沙特民众对沙特家族和谢赫家族垄断国家权力的现状颇为不满,要求进行民主化改革和赋予民众更多民主权利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沙特对外大力传播瓦哈比教义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适得其反,部分宗教界人士和宗教激进分子受原教旨主义的影响,不断对沙特家族统治的合法性和内政外交政策提出质疑,甚至寻求以暴力手段推翻沙特政权,倡导社会回归《古兰经》和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传统。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和“基地”组织原头目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都曾给沙特当权者贴上“不虔诚的异教徒统治者”的标签,呼吁其支持者反抗他们的统治,本·拉登对沙特家族的攻击旨在从理论上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sup>①</sup>

#### 四、中东民族国家构建中的伊斯兰认同及其根源

在部分中东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构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宗教民族主义通过伊斯兰教对民族国家的构建发挥作用,形成了宗教神圣性与政治世俗性结合、宗教观念与民族情感融合的伊斯兰认同,呈现出民族与宗教相互融合的特征,其成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惯性和传统的强大影响。中东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未能以公民民族主义取代族裔民族主义、以政治认同取代文化认同,导致民众对国家的忠诚和认同始终无法得以建立。相反,二战后,“民族国家”的概念在伊斯兰世界饱受质疑。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哈桑·班纳(Hassan al-Banna)曾极力反对以地域、语言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模式,坚持认为信仰是民族和国家的基石。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代表人物、巴基斯坦学者毛杜迪(Sayyid Mawdudi)则宣扬“真主权论”、反对“主权在民”学说、否定民族国家,主张建立“伊斯兰国家”。霍梅尼、拉希德·里达(Rashid Rida)、赛义德·库特布等伊斯兰主义理论家也都持有与毛杜迪相似的观点。显然,中世纪历史延续下来的宗教忠诚和宗教共同体归属感的形成,都对当代中东民族国家构建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对传统的依附关系,即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定义的“原初性忠诚(primordial loyalty)”<sup>②</sup>。

第二,伊斯兰教对身份认同的塑造作用。对穆斯林个体而言,伊斯兰教是塑造

<sup>①</sup> Sherifa Zuhur, *Saudi Arabia: Islamic Threat, Political Reform, and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 p. 17.

<sup>②</sup>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Clifford Geertz, ed.,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pp. 107-113.

自我身份的主要标志,也是获得民族认同和政治参与机会的前提,这种宗教认同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区分开来。对穆斯林集体而言,伊斯兰教塑造了对更小范围忠诚的认同,这种认同一方面将穆斯林与国内其他群体区分开来,另一方面,这种“穆斯林共同体”概念及其高效的组织机构给民族国家带来了更大挑战。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将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为目标。为此,穆兄会长期深耕于埃及社会,一方面积极宣扬回归《古兰经》、推动伊斯兰教在现代社会的复兴、建立具有神权政治特征的大一统“伊斯兰国家”;另一方面,穆兄会极力加强组织建设,其建立的机构包括清真寺、学校、基金会、媒体、慈善机构、医院等,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这为其政治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背景下,穆兄会经过数十年的等待终于赢得了2012年的埃及大选。2013年,穆尔西政权被军方推翻,穆兄会作为中东地区组织最严密的伊斯兰政治集团虽然在埃及军方打压下陷入暂时沉寂,但其政治潜能仍将对埃及政治进程施加影响。

第三,西方文化和全球化的影响。首先,全球化带来的科技变革,不仅拉大了中东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发展的差距,而且加速了中东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为伊斯兰认同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其次,西方文化、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等对中东地区的渗透,使伊斯兰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产生了冲突,继而引发了中东民众对西方的不满;最后,西方国家对中东事务的干涉,尤其是其对待中东国家采用的“双重标准”,进一步加深了穆斯林对西方的仇恨和抵制。在此背景下,面对西方“民族国家”模式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中东国家中相当数量的穆斯林倡导回归伊斯兰传统和强化伊斯兰认同。

第四,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尽管二战前的泛伊斯兰主义与战后诞生的新泛伊斯兰主义在社会基础、组织活动方式、指导思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其国家观的实质都是要建立以伊斯兰认同为核心、坚持真主主权的“伊斯兰国家”,这反映出穆斯林对西方化、世俗化潮流的抗拒。事实上,“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民族国家构建”的概念均是西方历史的产物,对中东地区而言仍属于“舶来品”,在该地区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和深入推进的条件,而中东伊斯兰国家本身脆弱的体制进一步加深了民族国家构建推进的难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泛伊斯兰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宗教认同,因其雄厚的社会根基和极具号召力的理论基础,对中东现代民族国家构成了巨大冲击,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

(责任编辑:包澄章)